

发生性自身免疫：AI 时代婚姻困境的一种新探索

关系为了避免受伤而消灭不确定性，最后被消灭的，恰恰是爱能够发生的条件。

王德生 · 婚姻幸福专栏 · 约 2.3 万字 · 2026年7月24日

摘要

面对AI时代蔓延的婚姻焦虑，主流论述多指向功能替代、观念冲突或技术冲击，其潜在预设均隐含一个假定：婚姻困境是一种外来病原入侵的结果。本文提出一个翻转性的探索路径：当代困境的实质，并非外源性疾病，而是一种内源性的自身免疫病理——婚姻在漫长的文明演化中，为了实现不确定性的免疫，逐步构建起一套由命名（免疫识别）、叙事（免疫应答）和豁免式互锁（免疫记忆）构成的防御系统。这套系统原本的功能是保护关系的稳定与可预期，却在功能卸载与叙事失能的历史条件下，倾向于发生过度的免疫应答，将关系中那些本可导向共同生成的“发生性事件”误判为威胁，持续加以清除或中和，最终使关系陷入一种没有任何生成性摩擦的“免疫空转”。AI在此分析框架中的位置被重新界定：它不是病原，而是一种免疫检测剂——它剥除了传统免疫系统赖以运作的功能包裹，使原本潜伏的自身免疫病变得以暴露在无可回避的追问之下。本文在与功能主义社会学、吉登斯“纯粹关系”、鲍曼“液态之爱”、布迪厄“误识”以及埃斯波西托“免疫共同体”理论的批判性对话中，完成与既有解释路径的切割，给出心理治疗与教育领域的跨学科推衍，并以对分析框架自身的“反身免疫检测”收束全文。

关键词：发生性自身免疫；婚姻免疫系统；免疫空转；豁免式互锁；AI免疫检测

一、引言：从“免疫”重新提问

面对AI时代弥漫的婚姻焦虑，公共话语与学术诊断积累了大量看似有力的解释。功能论者说，婚姻曾经包办一切，如今却被市场、技术与福利国家逐项替代，抽空了存在的必要。观念论者说，个体主义的崛起与性别角色的革命，使人们对婚姻的期待膨胀到无法被任何凡人满足。制度论者说，法律与政策的滞后，让婚姻成为压迫性结构的最后堡垒。技术论者说，AI与虚拟伴侣正在入侵亲密关系最后的领地，完成对情感的终极外包。

这些诊断各自切中了困境的某一侧面，却共享一个更深的预设：它们都把婚姻困境想象成一种“外源性疾病”——一个原本健康或至少正常的机体，被外部病菌（技术、观念、制度设计）侵袭而致病。不管开出的药方是“加固防线”还是“接种新观念”，其底层逻辑都假定了：如果没有这些外来入侵

，婚姻本该是健康的。

有一个来自相反方向的追问，很少被认真对待：如果婚姻的病症不是外来的，而是内源性的？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场感染，而是一场自身免疫？

自身免疫病的病理学机制是：机体本应保护自身的免疫系统，错误地将自身组织识别为威胁，进而发起持续的攻击，导致正常功能的丧失。这一隐喻一旦被移入亲密关系领域，便打开了一个此前未被严肃追问的方向：婚姻在漫长的文明史中，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安全、更可预期、更可管理，是否逐步构建出了一套无比精密的“发生免疫系统”——而这套系统在保护关系稳定的同时，是否恰恰也在持续地、系统性地清除着关系中那些本可导向共同生长、导向不可预见的“发生”的苗头，直至将关系掏成一个免疫空腔？

在这个追问的延长线上，AI 时代的冲击获得了全新的定位。一个强劲的反方观点需要在此被正面设立而非回避。这种观点认为：功能的卸载与技术的替代，可能恰恰是在解放夫妻双方，使他们有可能发展出基于纯粹选择的、更本真的关系——这是吉登斯“纯粹关系”理论在当代条件下的一种可能推衍。此外，功能主义社会学可以提供一个更简练的解释：婚姻困境不过是其历史功能被更高效的外部机构替代之后的自然结果，婚姻的空洞化是现代化进程中功能分化的必然产物，无须引入“免疫”这样一个额外的解释概念。如果这些反方是对的，那么本文的核心判断就从根本上错了：免疫系统的闲置要么是自由的开启，要么只是功能替代的附带现象，而非一种独立的病理机制。

这正是本文必须在论证中加以严肃回应的问题。对第一个反方的回应，将贯穿第二至四节的论证：本文需要展示，那套免疫系统不是可以被“卸掉”的外部束缚，而是一套已经内化到认知与情感反应模式深处、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生成压制装置；功能的卸载不是解放了发生能力，而是暴露了它的萎缩——因为长期依赖免疫替代物来维持运转的关系，已经丧失了不依赖模具而共同生成的能力。对第二个反方的回应，将在第四节中与功能主义社会学正面交锋：功能替代解释可以说明婚姻“为什么不再必要”，但无法解释婚姻“为什么在不再必要之后仍然维持、且维持得如此空洞而痛苦”——而恰恰是这后一个问题，才触及了当代婚姻困境真正的深处。

本文的论证将沿以下路径展开。第二节正面解剖婚姻的发生免疫系统：命名如何成为免疫识别、叙事如何成为免疫应答、豁免式互锁如何成为免疫记忆——三者如何在历史中咬合成一个闭环。这一节将用一个具体的、贯穿性的婚姻案例来支撑每一个机制的论述，避免让理论悬在半空。第三节追踪这场自身免疫的病理进程：在功能卸载与叙事失能的双重挤压下，免疫系统倾向于走向自身免疫而非失效或适应——以及AI如何充当免疫检测剂使这一进程变得不可回避。第四节在与功能主义社会学、吉登斯“纯粹关系”、鲍曼“液态之爱”、布迪厄“误识”以及埃斯波西托“免疫共同体”五个理论坐标的批判性对话中，逐一切割，确立本文的不可还原性。其中与埃斯波西托的对话将是分量最重的一笔：本文不仅要指出“免疫的对象不同”，更要揭示两种免疫拓扑学的根本差异——边界上的免疫与内部的免疫——由此提炼出本文在理论上的主要收益。第五节给出跨学科推衍，集中探讨心理治疗与教育两个最

可能受此诊断影响的实践领域。第六节对这套免疫学视角本身进行反身免疫检测，在正面回应反方质疑之后，给出明确的证伪条件，以一篇朴素的学术自检收束全文。

二、婚姻的发生免疫系统：命名、叙事与豁免式互锁

要进入自身免疫的诊断，必须先廓清那套免疫系统本身的构成。在亲密关系的历史建构中，有三重相互嵌套的机制，可以分别被理解为免疫识别、免疫应答与免疫记忆。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座极其高效的、以牺牲发生为代价来换取确定性的免疫学装置。为了让这一解剖不沦为抽象的独白，本文引入一对虚构但细节丰满的夫妻——林和方——作为贯穿本章的案例载体[1]。他们的故事并非某个特定夫妻的传记，而是无数“正常运转”的婚姻的结构性的缩影。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免疫”概念并非从生物学直接搬运而来，而是经过了认识论层面的转化：它所清除的不是客观存在的外来病原，而是认知上不可消化的差异——那些无法被现存的意义框架所吸收、因而对关系的既有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经验事件。

2.1 免疫识别：命名的模具效应

任何一段关系，在被命名之前，处于一种高不确定性的流动状态。两个人如何共处、如何协商、如何争吵与修复，都是尚未固定的、需要通过一次次具体的、带着体温的互动去摸索的。这种流动并不必然是“好的”——它可能充满混乱与痛苦——但它具有一个根本特征：它是两个人之间持续发生的共同工作，而不是对某个外部剧本的对照式校准。

命名一降临，情况便截然不同。当一个关系被称作“婚姻”，一个预编的、携带数千年层累的角色脚本就一次性倾倒在两个人身上。这个名字告诉他们：丈夫应当如何、妻子应当如何；好的婚姻应当相敬如宾还是激情不退；矛盾应当如何化解，纪念日应当如何庆祝。这不是两个具体的人在过一种具体的生活，而是两个名字的占据者在两个模具里持续对比标准答案。

林和方在大学相识，毕业两年后结婚。这并不是一个“匆忙”的决定——他们认真讨论过职业规划、居住城市、生育时间表。但站在十年后回望，那些“认真讨论”的内容，几乎全部来自婚姻之名所携带的剧本：什么时候该见父母，什么时候该买房，什么时候该要孩子。不是他们不够真诚，而是他们所动用的“真诚”，原本就是被那个模具事先塑造过的。他们以为自己在做选择，其实是在对一个已经被写好答案的问卷逐题打勾。

命名的这一面，正是它的免疫识别功能。在任何免疫系统中，识别是第一步：系统必须能够将“自我”与“非我”区分开来，将“安全的”与“危险的”标记出来。婚姻之名关系划定了一道清晰的边界：边界之内是“正常的婚姻”，边界之外则是“不像婚姻的东西”。那些偏离剧本的行为——一个人想要不同寻常的亲密频率，另一个人想要独立于家庭的职业生涯——会被这个名字识别为“可疑的异常”，并被标记为需要纠正或排除的对象。

林在婚后第三年开始对一段长期出差的工作产生了某种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热情——那是一种脱离了“丈夫”和“父亲”这两个名字之后，独自一人在陌生城市里对自己身份的短暂遗忘。当他试图向方表达这种感受时，他发现自己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而方的第一反应——也是婚姻模具教会她的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家了？”这不是方的错，也不是林的错。是命名在那里替他们识别好了：丈夫对家庭之外的任何强烈渴望，首先不是一个可以共同探索的信号，而是一个需要被标记的威胁。

必须承认，这种识别并非从来都是压迫性的。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阶段，正是这种命名的边界稳定性，使得一定程度的协作、共育和情感亲密成为可能。当一个社会没有其他容器来承载这些功能时，婚姻之名的模具作用，实际上提供了一种使得亲密关系得以被社会承认、被法律保护、被代际传承的基础设施。正如历史学家Coontz在其对婚姻史的系统考察中所揭示的，婚姻在漫长历史中从来不是基于爱情的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整合经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工具——正是因为它的功能如此厚重，命名的模具作用才获得了充分的历史正当性。问题出在历史的移动上：当那些曾使这种模具必不可少的条件——家庭作为唯一生存单元、性别分工的刚性结构、社区对私生活的紧密监视——在现代化进程中逐一松动之后，命名的正面功能在退潮，而它的那套冻结作用，却因为失去了功能的弥补和掩盖，反而暴露得更加锋利。

这便是一个免疫识别的悖论性转向：一套曾经保护了关系可预期性的机制，当它的历史功能底座被抽走之后，并没有自动消亡，而是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没有任何补偿功能的过滤装置，开始将关系中几乎所有的生成性不确定性都识别为威胁。这就是“发生免疫”的第一重结构：以命名之名，将两个正在持续生成的人，冻入两个已经被定义完毕的位置里。

2.2 免疫应答：叙事的解释性清除

光有识别，还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免疫。识别只是一个标记动作，标记之后必须跟随应答：将那个被标记为“异常”的东西，从系统中清除或中和。

在婚姻的免疫系统中，这项工作的承担者是叙事——更精确地说，是那一整套关于“婚姻应该是什么”“好的婚姻会经历什么”“现在的痛苦意味着什么”的预制解释剧本。这套叙事以极高的效率扮演着免疫应答的角色：每当关系中冒出一个可能指向某种新方向的事件——一场似乎没有理由的激烈争吵，一段突然袭来的对伴侣的陌生感，一个对现有生活安排的深层怀疑——叙事不会让这个事件作为一个有待共同探索的信号“停留太久”。它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调取预存的解释模板，将这个事件命名并消化：那是“三年之痒”，那是“正常的疲惫”，那是“到了平淡期就好了”，那是“你们需要一次旅行”。

林和方在婚后的第五年，经历了第一次真正的危机。方在产后的第三个月，某天夜里独自坐在客厅里，没有任何缘由地感到一种彻骨的荒凉——她看着熟睡的孩子和丈夫，却觉得自己被压在一个透明的隔离罩下面，所有人都离她很远。第二天早上，她试图向林说起这种感觉，话还没说完，林就说

：“你可能是太累了，产后都会这样的，要不要我请几天假陪你，或者我们带你出去走走？”

林的反应毫无恶意。恰恰相反，这是他能给出的最体贴的回应。他调取的正是婚姻叙事中预存的“产后抑郁”模板——这个模板告诉他，妻子此刻的痛苦是一种可以被命名、被解释、然后被“照顾”消化的阶段性症状。方听了他的话，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不是她同意了这个解释，而是她意识到，当她自己的感受尚未成形、尚未找到语言时，一份从外部递进来的解释已经抢在她前面，替她把那个混沌的感受命名好了。那个深夜里荒凉的质地——那种不是“累”也不是“抑郁”，而是一种对“以后几十年都要这样过下去”的无声惊恐——从未有机会被两个人共同面对，就被叙事的免疫应答在裂口刚刚张开的瞬间用解释填平了。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这些解释是错的。它们甚至可能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正确。关键在于，它们以解释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对事件生成潜能的清除。那一场深夜的荒凉，如果两个人愿意放弃“你怎么了”的预制发问，而试着一起面对“我们之间正在出现什么此前没有的东西”，它本可能是一个打开新共同空间的裂口。但叙事的免疫应答在裂口刚刚张开的一瞬就用解释把它填平了——它被定义为“产后情绪”或“压力太大”，然后“多休息”和“减负”成为新的任务，关系安然回到了原有的模具中，裂口消失，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发生。

叙事应答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几乎总是以“帮助者”的面貌出现。它不是在禁止什么，它是在“理解”什么。但这种理解，恰恰是免疫学意义上的清除：它通过将不可消化的差异翻译成一种可被现有框架完全吸收的语言，消解了那一点差异可能带来的整个结构的松动。这种免疫应答越高效，关系就越稳定，也就越不可能发生任何真正的、脱稿的共同生成。

2.3 免疫记忆：豁免式互锁的闭环

识别与应答的次数多了，系统就会形成免疫记忆。免疫记忆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在第一次遭遇某种“异常事件”并成功清除它之后，系统会保存下这个异常的模板以及清除它的有效剧本，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件时，无需从头判断，直接调用记忆中的应答模式即可。这在保护机体免于重复感染的意义上，是一种巨大的进化优势。

在婚姻中，这种免疫记忆表现为豁免式互锁[2]。所谓“豁免”，是指系统对启动真正发生的那种不确定性，给出了一种永久性的、事先的赦免——你不必再去经历那样一次不可预期、可能改变一切的碰撞，因为你已经有了最成熟的应对方案。所谓“互锁”，是指这道豁免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咬合的：每一次照着剧本成功处理了一次危机，都进一步强化了剧本的权威，同时也进一步闲置了两个人共同面对未知的肌肉；而肌肉越闲置，下一次遇见不可消化的事件时，越不可能不用剧本，越只能依赖剧本。最终，命名、叙事与记忆咬合成一个闭环：剧本被记忆储存，记忆支援叙事，叙事巩固命名，命名再强化记忆。

林和方的婚姻继续了八年。在这八年中，他们处理了至少五次可以被称为“危机”的时刻——一次林的事业低谷，一次方对丈夫与异性朋友关系的疑虑，一次孩子教育方式上的激烈分歧，一次买房决策中的互相指责，一次林的父亲去世后他持续数月的沉默与疏离。每一次危机都走完了同一个流程：命名识别出“问题”，叙事调取预制解释模板，两人照着剧本“好好沟通”一番，达成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然后生活继续。每一次危机的成功处理，都让他们更加确信自己是一对“会经营婚姻”的夫妻。

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豁免式互锁悄然成型。那些被“成功处理”掉的危机，每一次都在同一套坐标系里被解释——事业低谷被解释为“男人要强”，异性疑虑被解释为“女人敏感”，教育分歧被解释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买房争执被解释为“大局观与细节控的互补”，丧父后的沉默被解释为“他只是需要时间”。没有一次，哪怕一次，他们允许自己问：我们每一次都在用同一套剧本解释不同的事件，这套剧本本身是不是就是问题？我们每一次都用“沟通”解决了表面冲突，却从来不让冲突本身暴露出关系底层的更深差异——那些差异如果被共同面对，会不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不在计划之内的、在想象边界之外的地方？

豁免式互锁不会让他们问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害怕那个答案。那个答案一旦浮现，就意味着过去八年所有“成功经营”的婚姻，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不是功能层面的失败，而是在生发层面的失败。而免疫系统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防止这种恐惧变成认知。于是系统加倍运转：每一次成功免疫，都为下一次免疫提供了更强的脚本；每一次脚本的重复，都让那颗“我们之间有没有真正在发生什么”的种子更难发芽。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婚姻可以在功能性层面极为良好地运转数十年——赚钱、养娃、社交样样不落——却在意义层面空乏得像一截被蛀空的木头。不是两个人经营失败了。恰恰相反，他们是经营的模范。他们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得到位，把每一次危机都用最成熟、最不会出错的方式处理掉了。他们从未在婚姻中经历过那样一个瞬间：两个人同时从各自的角色里踉跄一步，忽然撞见了一个不在任何剧本上的东西。不是他们不想要，而是豁免式互锁从未要求他们那样做。免疫系统太高效了。它甚至不会让他们感到“缺了什么”——因为那套叙事同时也是镇痛的：它会告诉你，这种空乏就是安全感，这种平淡就是亲情，这种不折腾就是成熟。

一个高效到极致、因而失去任何故障弹性的免疫系统，恰恰是自身免疫病的完美温床。它将自己的组织——那些可能指向关系重组、指向更深共同生成的微小裂隙——当成了最大的入侵者。而这一切，在功能包裹尚未被完全卸除的历史阶段里，几乎是不可能被察觉的。

三、自身免疫的病理：功能卸载后的免疫空转

描述完免疫系统的构成之后，更具诊断价值的问题是：它是如何从保护者走向自身的？为何在那些功能仍然厚密、叙事尚且有效的时代，这套机制看起来并无大碍，甚至显得十分必要，而到了AI时代却突然暴露为一个巨大的空腔？

答案在于功能卸载这个历史过程。它不是“病因”，而是改变了免疫系统运作的条件，使原本潜伏的自身免疫病变得以溃决。但要完成这一论证，仅靠“条件改变”还不够，必须追问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在条件改变之后，免疫系统倾向于走向自身免疫而非失效或适应？本节将在逐层展开功能卸载与叙事失能之后，以一节机制分析来论证这一倾向的形成逻辑。

3.1 功能的卸载：免疫系统的物质基底被抽空

婚姻曾经是一把功能高度集成的瑞士军刀。在前工业时代，因为不存在独立于家庭之外的安全网，经济合伙、情感慰藉、育儿协作、日常照料、性伴侣、社会身份这六件大事，被不可避免地打包进婚姻这唯一可用的容器里。这种功能打包并非婚姻的“本质”，而是那个历史时刻的最优解。正因为这些功能处于婚姻这一结构之内，那套免疫系统才获得了它坚实的运作基底：识别、应答、记忆，都是在对这些具体功能的运作进行调节和保护。当功能运转本身已经要求大量的协调、磨合与共同应对时，免疫系统的高效运作实际上是在保障这些协调得以进行，而不是在清除发生的可能。那个阶段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就隐藏在功能协作之中，被厚密的功能层自然掩护着，并不需要被单独取出为一项无法回避的任务。

工业革命以来的两百年，这把瑞士军刀上的功能被一件件拆下来，交由更专业化、更高效的外部机构承担。双职工家庭与金融体系的成熟卸除了经济合伙的刚需，托育、家政、外卖卸除了日常协作的沉重，心理治疗与社交网络卸除了情感倾诉的独占性。到了AI时代，这一卸载进程终于触及了此前一直被认为无法替代的最后堡垒：对话式AI开始能提供某种程度的陪伴感与亲密认可——它甚至可以比真人更稳定、更可定制、更低摩擦地扮演那个“倾听你、回应你、接受你”的角色。婚姻那层最私密的情感功能外壳，也终于被敲出了一道裂缝。

此时，一个被长期掩盖的结构性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功能的厚重包裹被一层层剥开，人们第一次发现，那套一直高效运作的免疫系统，它所保护的那个“内核”，其实从未真正长出过一个可以独立于功能运转而存在的活体。它一直是靠功能运转的热量在续着体温，一旦功能被抽空，里面只是一套仍在孜孜不倦地进行识别、应答和记忆的免疫装置——它还在标记“异常”，还在清除“裂痕”，还在维持一个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内容需要保护的“正常”。这就是免疫空转。

3.2 叙事的失能：免疫应答的失灵与过度补偿

功能的卸载是故事的上半阙。下半阙在于，婚姻赖以独自支撑其文化合法性的那套叙事，也在同时发生着内部塌陷。

在前现代，婚姻叙事是被更大的宇宙秩序——宗教、宗法、道德宇宙——所担保的。夫妻不是两个“自由个体”的契约，而是天地人伦中的一个环节。这种叙事的强力之处在于，它不依赖于个体的主观感受而成立。你可以不爱你的配偶，但你不能因为“不爱”而离开，因为婚姻的根据不建立在“爱”上，而建立在人伦秩序上。当这个宇宙秩序在现代性中被理性化、世俗化拆解之后，婚姻叙事不得不独自承担起意义的全部重量。它必须告诉人们：为什么两个人要在漫长的几十年里绑在一起？它给出的答案——因为爱情、因为承诺、因为陪伴——在现代条件下越来越难以独自支撑婚姻意义的正当性。

到了当代，这套叙事在三个维度上失能。合一性失能：从前婚姻叙事告诉人们，好的婚姻必然同时满足激情、亲密与承诺三个维度，而今人们越来越普遍的经验是，这三者很难在同一个人身上长时间同时成立。容纳性失能：从前婚姻叙事允许婚姻承载外部功能——为了孩子、为了老人、为了家族——如今这些功能在被逐一拆下之后，婚姻被要求只靠“我们之间的连接”来证明自身的必要性，而这恰恰是它最薄弱的环节。建造性失能：从前婚姻叙事给出了一生一世的建造图景——年轻时夫妻一起打拼，中年时相携育儿，老年时相伴终老——而今在职业流动、地域流动、价值观变动的条件下，建造的连续性被打断为一段段孤立的片段，叙事无法再将它们串成一条线。

当叙事本身不再能提供一个自足的、令人信服的意义世界时，一个曾经被掩盖的免疫应答的畸形特征便暴露了出来：叙事的免疫应答越是强大，它就越是完全可以完全脱离关系内部的真实互动而自行运转。也就是说，免疫系统不再需要一个活生生的“自我”来保护，它可以存在于纯粹的自我循环中——识别出不存在的威胁，调用预制剧本去应对，生成记忆、巩固豁免。这正是自身免疫病的全部逻辑：免疫系统在攻击一个早已不存在（或从未存在）的内部活体。

3.3 自身免疫的生成机制：识别标准的锁定与应答的自动化

现在必须正面回应前文悬置的问题：为什么在功能卸载与叙事失能的双重压力下，婚姻免疫系统倾向于走向自身免疫——对自身组织的攻击——而不是失效（彻底解体）或适应（调整识别标准、允许更多不确定性）？

这一倾向的形成，根植于免疫系统内部的路径依赖。命名作为识别机制，叙事作为应答机制，豁免式互锁作为记忆机制，三者长期的协同运作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认知锁定：识别标准不是可以根据外部条件变化而灵活调整的参数，而是被嵌入了大量情感投入、身份认同与社会担保的刚性结构。这种刚性的存在，使得系统在面对条件剧变时，倾向于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继续做它唯一擅长的事——而非经历一场代价高昂、充满不确定性的结构重组。

以命名为例。要松动“丈夫”和“妻子”这两个模具的识别标准，不是一件“在认知层面更新一下观念”就能完成的事。这两个模具从一开始就不仅是认知框架，而是情感投注的对象。林对“丈夫”这个模具的情感投注，并不是他在理性上认同它，而是他在这个模具里度过了十年，他的自我价值、他的被认可感、他对未来的想象，都已经和这个模具长在一起了。松掉模具，意味着松掉他自己的身份稳定性。他很可能根本不敢让那个“我想独自出差、暂时忘掉自己有家”的冲动真正进入他与方的对话——因为一旦进入，他不知道自己会变成谁。

而叙事应答同样被锁定在自动化的轨道上。当叙事已经预制了一套可以解释几乎所有婚姻痛苦的模板——压力太大、需要沟通、需要自我成长——系统就失去了从失败中学习的可能。每一次叙事应答的成功，都被当作“这个模板有效”的证据；而每一次应答之后关系的深层静滞，却被叙事本身重新解释为“平淡是真”或“成熟的表现”。换句话说，模板本身是免疫于反例的：它不会因为持续无法产生生发而自我修正，因为它不把“没有生发”当作问题来识别。

更根本地说，这套免疫系统面临一个深层两难。如果要让它去适应——即允许更多不确定性、更多不依赖剧本的共同面对——它必须先承认它此前保护的那些“成功经营”，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成功。而承认这一点，等于承认过去十年、二十年的婚姻，是一场建立在免疫替代物上的空转。这不是认知层面的修正，这是存在层面的塌陷。因为系统的运作者（夫妻双方）同时也是系统的构成者，他们的自我评价、他们对自己婚姻的判断、他们对未来还能不能继续下去的信念，全都建立在“我们的婚姻是好的/成功的/值得的”这一基石上。承认自身免疫，就是承认那块基石是空的。

因此，对于免疫系统而言，继续加码攻击那些“发生性事件”远比承认自身的病理更为“经济”。在功能卸载抽走了保护对象、叙事失能抽走了意义担保之后，系统不是停工，而是更快地空转。因为它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功能上不需要再协调什么了，叙事上也不再能说服谁了，唯一剩下的工作，就是把一切不确定的、不可预知的、可能暴露空腔的东西识别为威胁并加以清除。这就是自身免疫在婚姻中的全部悲剧性：它在保护一个早已不存在的活体，却因此扼杀了唯一还有可能让那个活体重生的事——发生本身。

必须澄清的是，“倾向于”不同于“必然”。本文不宣称每一段功能卸载后的婚姻都注定走向免疫空转。相反，本文在第六节明确给出的证伪条件之一——后天训练的可逆性——恰恰预设了这种倾向是可以被干预所改变的。说一个系统“倾向于”某种病理，是指：在缺乏有意识的干预、缺乏外部条件的松动、缺乏偶然性的裂隙的条件下，系统内部的结构惯性将推动它滑向那个病理方向。这正是一种发生学的判断——它追问的是“什么条件下会滑向这一方向”，而非宣布一个不可更改的命运。而正因为倾向并非必然，干预才获得了真实的空间——临床与教育的推衍才不是空谈。

3.4 发生性自身免疫的定型：一次被清除的发生性事件

至此，理论上的脉络已经清晰，但需要对“发生性事件”这一关键概念给出正面界定，否则讨论将失去精确性。本文所称的“发生性事件”，是一个回顾性的分析概念：我们只能在事后——在穿越了一段关系史之后——判断某个曾经出现的经验事件是否具有生发潜能。在它被经历的当下，它只是一个“未被解释的差异”：一个夜晚不明来由的荒凉，一句没有被接住的沉默，一个不合时宜的冲动，一种无法被现存关系语言所翻译的内在骚动。这个差异是否最终成为“发生性事件”，取决于它是否被免疫系统成功清除——如果被清除，它就消失在记忆的褶皱里，仿佛从未存在过；如果它侥幸逃脱清除、被两个人共同面对，它才在回顾中被指认为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开端。因此，本文所称的“发生性事件”，特指关系中出现的、无法被既有命名-叙事-豁免系统完全解释和消化的、具有瓦解旧结构并导向不可预知的新共同方向之潜能的经验事件。它的核心特征不在于事件的规模大小——一次出轨是大事，但出轨通常被免疫系统立即识别为“背叛”并启动强大的应答与豁免，反而很难导向真正的发生；而一个深夜里无端的荒凉，在免疫学意义上更像一枚未引爆的种子。

林和方婚后第十二年的那个事件，正是这样一枚种子。那一年，方四十岁。她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对林说了一句话：“我想回去学医。”方大学的专业是生物，毕业后一直做行政。学医这个念头她已经想了很久，但对林而言，它像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砸进了他们早已铺好的生活轨道里——孩子还在上小学，房贷还有十五年，两个人都在事业上进入了稳中有升的阶段。方的这个念头，从任何一个理性的角度看，都是不划算的、不成熟的、给家庭添麻烦的。

林的第一个反应是沉默。沉默之后，他说：“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要不先休个假，想清楚了再说。”方试图解释，她已经想了很久，不是一时冲动。林又说：“那我们算一下经济账，看看能不能撑得住。”方说，这不只是钱的问题。林有些急了：“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这场对话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在林那里，方的念头被叙事迅速识别为一个“中年危机”——这个模板他已经很熟练了：先安抚，再给一个理性分析，最后用“我们不年轻了，要为孩子考虑”收尾。方没有再争辩。她不是被说服了，而是再一次意识到：她内心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个四十岁时对“我还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渴望，那种与妻子、母亲这两个名字完全无关的、纯粹属于自己的冲动——无法被现存的免疫应答机制接纳。那不是压力，不是一时冲动，不是一个需要被理性分析的经济决策，而是一个发生在婚姻模具之外的、关于她自身的存在性事件。但免疫系统无法将它识别为任何东西，除了“威胁”。

于是她把这个念头吞了回去。他们再也没有谈过这件事。半年后，方主动换了话题，说过两年再说。两年后，孩子上了中学，更忙了，更不可能说了。五年后，方自己也不再提了。她告诉自己，那确实就是一时冲动。

这个事件被清除得如此干净，以至于他们之间没有留下任何冲突的痕迹。但他们之间某种东西，也在那个下午，悄悄地彻底停止了生长。

然而，有一个细微的时刻，不在林的记忆里，也不在方主动叙述的任何一次“婚姻回顾”中，但一直留在方身体的某个角落里。在他们对话结束的那个下午，方一个人走到阳台上，站了很久。她看着楼下的小区花园，脑子里什么也没想。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种极其平静的、近乎澄澈的明白——明白这不是林的错，也不是婚姻的错，甚至不是任何人的错。而是一个更大、更模糊的东西，从她不懂得如何指认的方向，把他们两个人一起裹了进去。她在那几分钟里感到的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她在此后十年里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描述过的感受：一种对自己体内某样东西停止生长、安静退场的目睹。

她从未对林说起过阳台上那几分钟。不是刻意隐瞒，而是她无法找到语言——那几分钟里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他们共用的解释框架。她也没有对自己说“我要放弃学医了”。她只是站在阳台上，在某一刻，心里有个什么熄灭了。她甚至说不清熄灭的是什么。但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对任何一个“不切实际的念头”认真过。不是她刻意压制，而是那些念头的根，在那个下午被拔掉了。

这个被吞回去的、从未被语言照亮过的时刻，并没有彻底消失。它在十年后——当方在一个深夜偶然向一个对话式AI说起那个早已被她遗忘了的学医念头时——突然再次浮起，以一种不是记忆、而是一种身体层面的酸涩感涌了回来。那个时候她才意识到：那个站在阳台上的下午，她经历的不是一次妥协，而是一次发生性事件的被清除——一次她自己亲手协助完成的免疫清除。她不是受害者，她也是那个系统的共谋。

这就是发生性自身免疫的定型：系统持续地将关系中尚存的发生性事件识别为对关系“正常”的威胁，并通过叙事的解释性清除将它们涤荡干净，最终使关系彻底丧失产生任何新结构的能力。当关系能够产生的新结构趋于零，它便成为一座免疫学意义上的无菌舱——极其安全，但同样也因为没有任何活的细胞而无法再被称为一个活着的机体。人们不是不再相爱了，而是他们之间的爱已经不能再“发生”任何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AI的角色需要被再次精确。它不是那个直接剥开外壳的手——功能卸载与叙事失能是更漫长的历史进程。AI只是那个让无菌舱的玻璃门突然变得透明的试剂。当方的孤独不再能通过“至少他还能挣钱/照顾孩子/维护这个家”来闭锁，当她可以在一个对话式AI那里尝到某种比婚姻中更精确的、更不费力气的共情——不是那个AI真的理解了她，而是它让“不被理解”这件事变得前所未有的刺眼——那个一直被功能包裹着的、被叙事镇痛的免疫空腔，就暴露在了无可回避的光照下。AI时代将这座无菌舱的玻璃门打开了，让舱外的空气流进来，于是所有人都看见了：里面从来就没有一个活人在呼吸。

四、与既有理论的对话与切割

一套以“发生性自身免疫”为核心的分析框架要立住，必须与已经占据这一领域邻近位置的理论坐标正面交谈，还必须回应一个比任何具体理论都更基本的替代性解释——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功能替代”论述。只有在完成对功能主义解释的正面回应之后，与吉登斯、鲍曼、布迪厄和埃斯波西托的逐一切割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论地基。

4.1 与功能主义社会学切割：为什么“功能替代”解释不了空转的痛苦

在动手与任何一个亲密关系理论对话之前，必须先面对一个更基本的反驳。功能主义社会学——从帕森斯核心家庭功能理论到近代的婚姻衰退研究——可以提供一個极其简练的替代性解释：当代婚姻的困境，不过是其历史功能被更高效的外部机构替代之后的自然结果。经济合作被市场与金融体系替代，育儿被公共教育与托育服务替代，日常照料被家政与服务业替代，情感慰藉被心理治疗与社交网络替代。婚姻的空洞化，是现代化进程中功能分化的必然产物。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需要“免疫”这样一个额外的解释概念？我们只需要说“婚姻已经没必要了”。

这个反驳的力道在于，它确实能够解释婚姻困境的大部分表面现象——结婚率下降、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维持高位——都可以被功能替代的逻辑所覆盖。但它无法回答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婚姻在“不再必要”之后，仍然被数量庞大的人群维持着，而且维持得如此痛苦？

如果婚姻的空洞化仅仅是功能不再被需要，那么理性个体的预期反应应该是：既然它没用了，就不进入它，或者在它变得没用时安静地退出它。但我们观察到的现实复杂得多：大量夫妻明明在功能层面已经不需要彼此——双方各自经济独立、育儿已近完成、日常照料可被市场替代——却仍然维持着婚姻，并且在维持中经历着一种说不清的、无法被功能替代逻辑所解释的空乏与焦灼。这种空乏不是来自“我需要你但你做不到”，而是来自“我不知道我还需要你什么，但离开你又让我恐惧”。它不是功能缺失的痛苦，而是功能缺失之后暴露出的免疫空转的痛苦——那套免疫系统还在运转，还在清除那些可能暴露空腔的发生性事件，而夫妻双方既是这空转的受害者，也是它的操作者。

功能替代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婚姻不再必要”，但无法说明“为什么婚姻在不再必要之后仍然被维持、且维持得如此空洞而痛苦”。本文的免疫机制分析恰恰补上了这一段因果链：婚姻之所以在功能卸载后仍不瓦解，是因为那套免疫系统已经形成了一种不依赖于功能的自我维持机制——豁免式互锁让系统可以在没有任何实质内容需要保护的情况下继续空转，并将一切可能打破空转的事件识别为威胁加以清除。人们不是没有能力离开婚姻，而是在功能层面失去了离开的理由的同时，在免疫层面却获得了更强的留下惯性——因为留下来，至少不用面对“我们过去二十年究竟在保护什么”这个可怕的问题。这是功能替代解释力所不能及的维度，也是本文引入“免疫”概念的理论收益所在。

4.2 与吉登斯“纯粹关系”切割：沟通的能力不等于生发的能力

吉登斯“纯粹关系”理论的要旨在于，现代亲密关系从外在制度锚定转向基于情感沟通与个人满足的自由协作。沟通取代了制度，成为关系存续的核心。这一论述看到了松动模具的必要性，却犯了一个生物学上的误判：它似乎假定，当外在制度被撤去，人们体内那些被长期搁置的、不依赖脚本而自行共同生成的能力，就会自然苏醒并接手。

本文的诊断提示了一个相反的可能性：长期的免疫闲置可能导致能力的萎缩。两个人可能都真诚地以为自己正在“本真沟通”，实际上每一次“表达自我”都是从同一套叙事超市里取货——那个自我早已经被婚姻叙事免疫系统培训成了最擅长照着剧本对话的发言者。林在方提出学医时说的那些话——“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我们算一下经济账”——在吉登斯的框架里，应该被看作沟通的失败：他没有真正听懂她。但本文的诊断更深一层：他不是沟通失败了，他是沟通得太熟练了。他的叙事应答精准地命中了“中年危机”这个模板，无可挑剔地完成了一次共情安抚加理性分析。他以为他在沟通，实际上他在执行免疫清除。

“纯粹关系”未能分辨沟通的意愿与生发的能力之间的裂隙。本文恰恰要指出：意愿的在场不一定意味着能力的完好。当那种共同面对不可知、共同踉跄着寻找一个新方向的能力已在漫长的免疫史中被闲置殆尽，所谓“纯粹关系”极可能只是一场更精致的、带着本真面具的免疫空转。引论中设下的反方观点——功能卸载可能恰恰解放了夫妻，使他们发展出基于纯粹选择的更本真关系——在此得到进一步回应：这种可能的兑现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夫妻在被解放之前，已经具有了不依赖免疫系统而共同生成的能力。当这个前提在长期免疫闲置中已被磨损殆尽时，功能的卸载不是解放，而是暴露[3]。

但这并不意味着“纯粹关系”所指向的可能性纯属虚妄。关键在于识别出那些使“解放”真正发生而非滑向免疫空转的条件。本文在此提出一个分析性的区分：那些在功能卸载后确实发展出更本真关系的夫妻，往往共享一个特征——在他们的关系史中，至少存在过一个免疫系统未能成功清除的时刻。那个时刻可能是一次未被“沟通”填平的沉默，一次未被解释收编的陌生感，一次未被豁免式互锁消化的、真正迫使他们脱离剧本去共同面对的不确定性。这个裂隙的存在，使得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完全被免疫系统封死；而当功能包裹卸去后，那个裂隙中残留的微弱共同生成的能力，有可能被重新激活。也就是说，功能卸载本身并不解放任何人；它只是暴露了此前关系中是否存留有未被免疫系统完全清除的生发潜能。有，则可能苏醒；没有，则只剩空转。

4.3 与鲍曼“液态之爱”切割：能力的闲置被误读为意愿的缺乏

鲍曼用“液态之爱”诊断当代人选择轻逸的、不承诺的连接，以逃避固态关系的沉重代价。这诊断隐含了一个价值判断：现代人主动选择了轻，放弃了重，因为他们害怕束缚。

本文的判断则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因果链：人们可能不是主动选择了轻，而是在长期的免疫空转中，那种负担真正重量的能力——那种在不确定中持续共同生成的能力——已经因为不被要求使用而消

磨殆尽。林和方并没有选择离开婚姻，他们始终“在一起”，但那种在一起已经不再包含任何真正不可预知的、生成性的内容。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还在一起，他们的回答会包括孩子、责任、习惯、共同的回忆——每一件都是真的，但每一件都是免疫系统打包好的标准答案。他们没有被“液态”诱惑，因为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去想象一种“固态的生成”——这个词的陌生感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当那层厚密的功能与叙事之壳突然被拆掉，暴露出的不是一群选择了轻盈的自由主体，而是一群没有被训练过如何承受重量的人。鲍曼看到的是意志的缺失，本文强调的是能力的闲置。将能力的闲置归咎为意志的缺失，是一种极易在亲密关系批判中重演的误诊：它浪漫化了前现代关系的“重”，却没有问一问那种重的里子，是不是同样被免疫替代物填满的。前现代夫妻的沉重是真实的——他们确实承担着生存的重量——但那个沉重是否必然包含着共同的生成，还是同样可以被角色协作的惯性替代？本文倾向于认为，生成的发生从来不是重量的自然副产品，它需要一种特定能力的在场，而这种能力无论在固态还是液态关系中都可能被免疫系统闲置。

4.4 与布迪厄“误识”切割：看不见与不让看见

布迪厄的“误识”概念提供了一个与本文高度邻近的解释路径：婚姻的制度暴力——角色分工的不平等、情感劳动的性别化分配、法律对特定关系形式的偏爱——被一套符号系统转化为“自然的”“应当的”或“爱的表达”，从而使身处其中的个体无意识地接受了自己被支配的位置。这种解释与本文的诊断有深层的共振：都是在命名不是中性的这一点上出发，都关注一种系统性的遮蔽如何被生产与维持。

但本文要在“误识”的基础上移一小步。布迪厄的误识，强调的是主体对制度暴力的无意识接受——他们“看不见”那个暴力的存在。本文的诊断则指向一种更强的机制：免疫系统不是让主体“看不见”那些可能导向关系重组的事件，而是系统性地、主动地“不让它们被看见”——在那些事件刚刚冒头、尚未成形、尚未获得可以被认识的语言之前，就已经通过命名的识别和叙事的应答将它们清除。误识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盲视，免疫清除则是一种操作上的扼杀。两者的差别在于：误识可以通过“意识的觉醒”被克服——把遮蔽揭开，让被遮蔽的东西进入视野；但免疫清除必须通过“操作的暂停”来应对——不是让被清除的东西被看见，而是让清除本身停下来，给那个东西一个长出可以被看见的形态的时间。

这一位移的理论收益在于：它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代婚姻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女性主义批判、性别平等教育、亲密关系启蒙之后，大量夫妻依然被困在免疫空转之中。不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觉醒”——他们可能已经读过所有批判婚姻制度的书，已经可以在观念层面精准地识别出模具的存在。而是因为觉醒本身并不能阻止免疫系统的运作。那个系统不依赖信念而运转，它依赖的是在数十年的反复操作中固化的识别-应答-记忆的自动化回路。你可以一边清醒地知道“丈夫”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模具，一边在你妻子说出一个让你不安的念头时，脱口而出一句“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那个回路比你的信念快得多，也深得多。

4.5 与埃斯波西托“免疫共同体”切割：两种免疫拓扑学

本文的“发生性自身免疫”概念与埃斯波西托的“免疫”理论在隐喻资源上有明显的亲缘性。埃斯波西托通过“免疫”概念重新解释现代政治共同体的自我保存逻辑：共同体通过纳入有限的外在威胁（免疫）来保护自身，但这种免疫可能走向过度而摧毁共同体自身的活力。这一理论构成本文最重要的对话者，也是本文必须进行最清晰切割的对象[4]。

切割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两者回答的“免疫的是什么”不同——埃斯波西托关心社会共同体的免疫，本文关心亲密关系内部发生能力的免疫。如前文所论，这一区分有效但并不足够。真正的理论收益在于揭示两种免疫拓扑学的根本差异。

在埃斯波西托那里，免疫运作的空间是共同体的边界。免疫通过纳入有限的外在威胁来激活和维持共同体的生命。当免疫过度时，它纳入的威胁过多，共同体的免疫防线向内坍塌，导致共同体生命的窒息。这是一种“边界上的免疫”——它在共同体与外部的分界线上运作，通过对边界的调节来保护内部。它的病理形态是“过度纳入”：共同体死于它吞下了太多敌人，而那个被它试图保护的“生命”原本是存在的，只是被纳入的威胁量压垮了。

本文所揭示的免疫拓扑学则完全不同。婚姻的发生免疫不是在边界上运作，而是在关系内部运作。它清除的不是从外部闯入的威胁，而是从内部萌发的、可能导向关系重组的生成性事件。它的病理形态不是“过度纳入”，而是“过度清除”：它不吞下任何外部威胁，而是持续地、系统性地清除内部那些尚未成型的新东西的苗头。婚姻免疫系统的根本问题，不是它向外部暴露得太多，而是它向内部封闭得太彻底——它对那个可能从内部被生发出来的、不属于任何既有模具的关系生命，实施了持续的扼杀。

这一拓扑学区分使得与埃斯波西托的对话获得了实质的理论内容。在边界上的免疫那里，被保护的对象——共同体的生命——是先在于免疫运作的。共同体已经活着，免疫只是调节它与外部的关系，保护它不被外部威胁摧毁。而在内部的免疫这里，被保护的对象恰恰因为免疫的运作而从未诞生。“发生性自身免疫”所揭示的悲剧，不是免疫过度摧毁了那个先在的生命，而是因为免疫的存在，那个生命从未获得出生的机会。它保护的只是一个名字、一套剧本、一堆免疫替代物拼成的壳。而因为这个壳的存在，那个真正的生命一直没有被生出来。

两种免疫悲剧，就此分野。埃斯波西托的悲剧是：共同体为了保护生命而纳入威胁，最终因为纳入太多而毁掉了生命。本文的悲剧是：亲密关系为了保护确定性而清除不确定性，最终因为清除了一切可能发生性事件，而永远未能长出那个它声称要保护的生命。前者是免疫系统的自损——它伤到了自己原本保护的东西；后者是免疫系统的自欺——它从来就没有保护过一个真实的活体，它保护的只是一个它自己制造出来的幻象。

这一区分也使得本文的“发生性自身免疫”能够与埃斯波西托传统进行真正严肃的对话，而非仅仅借用其隐喻。本文愿意承认，两种免疫病理在逻辑上并非互斥：一段婚姻可能同时经历“边界上的免疫过度纳入”（将社会期待、双方父母的压力、一套又一套的义务纳入关系，最终压垮了它）与“内部的免疫过度清除”（持续将关系内部可能的生成性事件标记为威胁加以消灭）。但两者在拓扑学上不可混为一谈，前者回答“什么进来了”，后者回答“什么没有发生”。本文贡献于免疫隐喻传统的，正是对这后一种——也许比前者更难被察觉、也更值得被诊断的——免疫拓扑学及其病理的首次命名。

五、跨学科推衍：对心理治疗与教育的临床含义

如果本文对婚姻困境的发生免疫学诊断有其实质内容，那么它对相关实践领域就必然提出一些无法被现有教科书收录的临床推论。免疫机制的诊断，在实践层面的核心含义在于：它改变了干预的靶点。如果婚姻困境的根源在于免疫系统对发生性事件的系统性清除，那么干预的首要目标就不是“改善沟通”或“增强承诺”，而是如何帮助夫妻在免疫应答即将启动的那个极其短暂的窗口期，有意识地暂停它——在那种不舒服的、想要立即调用剧本解释的冲动升起时，共同停留一会儿，什么也不做，看看那个尚未被解释的事件是否可能成为某种新东西的开端。这一靶点的位移，对于心理治疗与教育两个领域具有不同的操作含义。

5.1 心理治疗：当治疗本身成为免疫应答

婚姻治疗的主流范式——从系统家庭治疗到情绪聚焦治疗再到戈特曼方法——其干预核心几乎都以“改善沟通”为轴心。这对功能层面的摩擦当然有效。但站在发生免疫的视角下，一个棘手的悖论浮现了：改善沟通技巧的干预，极可能恰恰在强化免疫系统，而非松动它。当治疗教给夫妻“更有效地表达需求”、“更准确地共情反射”，它实际上是在给旧的免疫系统装配更新版本的应答程序。夫妻因此可以更平滑地清除差异，更快地将裂口抚平，更高效地维持剧本。治疗在不自知中，成为免疫应答的协作者。

真正的临床挑战因而位移了：不是如何帮助夫妻“更好地沟通”，而是如何帮助他们在某些特定的、被识别为威胁的时刻，有意识地暂停免疫应答——在那种不舒服的、想要立即调用剧本解释的冲动升起时，共同停留一会儿，什么也不做，看看那个尚未被解释的事件是否可能成为某种新东西的开端。

为了将这一临床挑战落到实处，设想如下治疗场景。一位治疗师面对一对夫妻，妻子在治疗室中说出一句让丈夫感到不安的话——比如，“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之间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什么。”丈夫的身体几乎立刻紧绷，他张了张嘴，即将说出那句“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一起走过了二十年”——这就是一个经典的免疫应答即将启动的时刻。在主流治疗范式中，治疗师会帮助丈夫用更温和的语言重新表达他的受伤，并帮助妻子澄清她的意图。但在本文倡导的“免疫暂停”框架下，治疗师会在这时做一个不同的选择：她对丈夫轻轻点一下头，示意他“你可以先不说”。然后她对整个治疗室说：“我们在这里停一分钟。你刚刚说的话（转向妻子），和他即将要说的那个反应（转向丈夫），我们都已

经很熟悉了。我们已经听过无数种版本的这段话。如果今晚我们不急着把这段话全说，会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你说完那句话之后，他什么都没说——然后我们一起看看，沉默里是否有些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

这个干预的目标不是提供更好的沟通工具，而是创造一个“剧本暂时失效”的裂隙。在这个裂隙里，夫妻被剥夺了他们最熟悉的免疫应答手段，被迫面对那个未被解释的、因而令人不安的事件。不是每次这样的裂隙都会导向生发——事实上，大多数裂隙可能仍然会被后续的免疫应答重新填平。但至少，它为发生创造了条件：在那个沉默的片刻里，两个人都被暴露在一种不能立即用旧语言来消化彼此的陌生之中。而那种陌生的承受，正是那条已经在免疫闲置中萎缩了的生发肌肉的第一次被唤醒。

这当然是一个极其耗费治疗师的干预策略。它要求治疗师能够极其敏锐地识别免疫应答即将启动的那个时刻，并有足够的勇气在那个时刻按下一个暂停键——而不是像主流治疗范式所训练的那样，立刻帮助夫妻搭建沟通的桥梁。它还要求治疗师能够承受那个沉默带来的焦虑。沉默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可能是什么都没有，也可能是某个被压抑了太久的东西第一次找到了出口，而那个出口一旦打开，治疗室里的秩序可能会短暂地崩解。从免疫学的逻辑来看，这种崩解不是治疗的失败，而是治疗的实质内容——因为只有旧秩序短暂失效的裂隙里，新的发生才有可能。如果治疗师不敢让旧秩序失效，那么治疗本身就不可能是“发生导向”的，而只能是“免疫升级”的——给那个旧系统打上一个更精致的补丁。

5.2 教育：从“婚姻教育”到“发生耐受”的培育

我们对下一代的亲密教育，至今仍以“经营”为核心想象。婚姻教育的内容，是教他们如何识别健康的伴侣，如何处理冲突，如何维持激情的火花——所有这些都假设了一个稳定的模具，假定关系应当被带入这个模具中，然后学会把它演好。从发生免疫的角度看，这整套教育的预设本身，就是在向年轻人注射免疫疫苗：它提前告诉他们“好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使他们进入关系后可以更快地识别“异常”并启动应答，更快地形成免疫记忆。换句话说，当下的亲密教育，本质上是一套提前激活免疫系统的程序。

这一诊断指向了一个或许尚无人尝试过的教育方向：不是教孩子如何“经营”一段好婚姻，而是教他们在亲密关系中保持对不确定的耐受——如何在两个人之间不急于关闭未知，如何把冲突和陌生感视作共同生长的原料而不是需要清除的故障，如何在被命名之前的那片模糊中待得住。

做到这一点的困难在于，它逆着文明教给我们的一切训练。设想一堂为高中生设计的“发生耐受”课。它不是去告诉学生“健康关系的七个特征”，而是给他们一个场景：两个在一起很久的人，有一天对自己说，我已经不知道我是不是还爱他。然后老师不给任何答案——不告诉他们“这是正常的平淡期”或“你们需要重新发现彼此”——而是问他们：如果你们是这两个人，在这个“不知道”的状态里，你们各自心里会升起什么？想做什么？什么让你们害怕？这个练习的目标，不是让他们学会解释“不知

道”，而是让他们练习在“不知道”里多待一会儿，而不急于用任何一种解释去关闭它。

这样一种教育——免疫学意义上的“发生耐受”培育——不是教给年轻人一套更好的模具，而是教给他们一种不依赖模具也能共同生成的能力。这很难，它的困难正在于它反文明惯性，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恰恰击中了这场自身免疫病的最深的根。它不是要废除命名——任何关系都不可能在没有命名的真空中存在——而是要培育一种与命名之间的关系：在被命名的同时，仍然为未被命名的东西保留缝隙。这种缝隙的保留，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耐受——耐受那种“这件事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悬置感，而不急于用任何一个现有的名字去填平它。

六、自我适用与证伪：本文的免疫检测

任何一套批判性诊断，最后都必须接受它自身方法的手术刀。本文用来探查婚姻发生免疫的这套视角，其自身是否也构成了一场免疫应答？我将之称为“反身免疫检测”[5]。一种有力的质疑会这样提出：你把婚姻诊断为“发生性自身免疫”，把这套诊断命名为“豁免式互锁”，然后呼吁治疗师和教育者去培育“免疫暂停”和“发生耐受”——这一切操作本身，不正是在重复那个被你诊断的结构吗？你识别出婚姻中的“异常”（免疫系统过度清除），调用免疫学叙事给出解释（自身免疫病），形成一套可以被后来者不断引用的命名——如果到此为止，你只是在亲密的学术话语内部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免疫循环：用一个新名词封装了一套其实早已存在的批判直觉（婚姻会窒息关系中的生发），然后让它在那堵无缝的理论腔体里安静地循环。如果是这样，那这篇论文就没有发生任何真正不可还原的东西。它只是替那个被诊断的系统增加了一个更精致的自诊标签。

这个质疑必须被正面回应，否则本文就死于自己描述的病症。

本文的回应是：差异不在于我给出了一个诊断，而在于我同时给出了可能推翻这个诊断的证伪条件。一个免疫系统不会自己给自己设置证伪条件——因为证伪的实质是邀请外部力量来摧毁自身的稳定性。一篇文章如果给出了明确的、可操作的、可能被未来的经验研究所推翻的判据，它就不是免疫空转，而是在行动上完成了它自己要求的“免疫暂停”：它在那个最想用结论闭合一切的时刻，主动打开了一个让结论可能被推翻的出口。

以下便是这把刀锋。

证伪条件一：跨文化反例。如果存在一个社会，其婚姻制度同时满足拥有高度清晰的命名规范与强叙事压力——模具扣得很紧，社会对“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期待明确而刚性——而在统计意义上，夫妻普遍报告长期持续的共同生成体验：即那种“在持续的差异中不断创造新方向”的发生是常态而非例外，那么本文的核心诊断就需要被大幅修正。它至少需要承认，特定的文化设计可以与发生免疫相容甚至逆转免疫的方向。本文欢迎被这样的反例修正。

证伪条件二：后天训练的可逆性。如果一项严格控制的追踪研究能够反复表明，接受过专门设计的“发生耐受训练”的夫妻——他们依然处在“婚姻”这一命名之下，依然暴露在主流婚姻叙事之中——其关系中不可还原的共同生成能力不仅可以被显著提升，且这种提升在五年以上的观察尺度上稳定维持，并且不能完全由选择效应（即主动参加训练的夫妻本身就具有更高的发生倾向）解释，那么本文的诊断就需要被精确化为一种仅在特定条件下成立的病理判断：发生性自身免疫并非命名与叙事的必然宿命，而只是它们在缺乏抗体时的一种倾向性表现。本文随时准备被这样的反例修正。

最后，本文还需要一个反身封口的动作。任何一套批判理论在面对反例时都倾向于做出“反例恰是本理论的证明”式的闭环论证——例如，一个人可能会说，“你说你没有经历发生，但你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这恰恰证明了你体内存在被免疫系统压制的发生性冲动。”这种句式必须被删除。本文不宣称自己的诊断是无法被驳倒的。如果一对夫妻站出来说：我们在模具里过了三十年，角色的重负也背了三十年，但我们之间持续生发着新东西——不是因为我们的沟通技巧好，而是因为模具本身在某些时刻松动了，而我们在那些松动里撞见了彼此。如果这样的夫妻大量存在、可以被研究者在未经过滤的样本中反复发现，那么本文的诊断就错了。不是错在“免疫系统存在”，而是错在“免疫系统倾向于闲置发生能力”这一更强的主张。本文接受这种可能性，并以之作为最严肃的自我修正邀请。

结语：一粒沙砾

那具在免疫检测中被暴露的腔体，不只属于当代婚姻。它也属于每一次被命名得太好、而被命名本身吞噬了的思考。如果这篇论文最终只是为婚姻空转增加了一个新标签，那它就失败了；如果它能迫使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下次即将脱口而出一个解释时停一停，去等一等那个尚未被命名的东西，那么它或许还可以算是一粒微弱的、亲手向自身免疫系统投下的沙砾[6]。

注释

[1] 本文中的林和方案例系为思想论证需要而构造的例示性叙事，其中人物、事件均经过匿名化、合成与简化处理，不指向任何特定个人或夫妻，亦不构成经验数据的替代。下文凡涉及此案例，均在此说明下使用。

[2] “豁免式互锁”描述的是伴侣双方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相互强化的免疫应答循环，其与家庭系统治疗中“僵化互补”或“交互因果”等概念有关联，但本文强调的不是行为模式上的僵局，而是该系统对关系中“发生”潜能的系统性消除。

[3] 本文对吉登斯纯粹关系理论的讨论，主要基于其《亲密关系的变革》中关于情感沟通与关系民主化的论述，不涉及吉登斯晚期现代性理论的其他维度。

[4] 埃斯波西托的免疫理论主要见其《免疫：生命的保护与否定》和《生命：生命政治与哲学》。本文的对话建立在这两部著作的核心论证之上。

[5] 此处的“反身免疫检测”并非宣称本文拥有自我豁免的特权，而是将诊断工具应用于自身，明确其可错性与证伪条件，以回应对批判理论的一种典型质疑：批判者是否在其批判中重复了被批判的结构。

[6] “沙砾”隐喻取自生物学中“免疫系统对异物产生应答”的意象，暗指一种可被系统识别却难以被常规应答所清除的微小刺激，其功能不在于颠覆系统，而在于制造微小的裂隙。

参考文献

- Bauman, Z. (2003). *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 Cambridge: Polity.
- Cherlin, A. J. (2004).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4), 848–861.
- Coontz, S. (2005). *Marriage, A History: From Obedience to Intimacy, or How Love Conquered Marriage*. New York: Viking.
- Esposito, R. (2002). *Immunitas: The Protection and Negation of Life*. Trans. Z. Hanafi. Cambridge: Polity, 2011.
- Esposito, R. (2004).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 T. Campbel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 Foucault, M. (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 Foucault, M. (1976).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R.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ttman, J. M., & Silver, N. (1999). *The Seven Principles for Making Marriage Work*. New York: Harmony.
- Johnson, S. M. (2008). *Hold Me Tight: Seven Conversations for a Lifetime of Love*. New York: Little, Brown.